

## 賢嗣傳家學，古史有餘音 ——顧潮教授訪談錄

車行健、徐其寧\* 整理

顧潮，江蘇省蘇州市人，當代著名經史學家顧頡剛(1893-1980)先生的女公子。一九四六年九月生於上海，一九七〇年畢業於北京農機學院水利系，一九八一年進入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歷史研究所，二〇〇一年任研究員，現已退休。長期致力於顧頡剛著作的整理與研究，撰有《顧頡剛年譜》、《顧頡剛評傳》(與顧洪合著)、《歷劫終教志不灰——我的父親顧頡剛》、〈顧頡剛與胡適〉及相關研究論文二十多篇(參附錄)，其中《顧頡剛年譜》獲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歷史研究所第二屆優秀科研成果獎(1996)。

二〇〇七年七月下旬，林慶彰教授為執行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民國以來經學研究」計畫，特地組織了一支學術考察團赴中國上海、北京二地訪察民國時期與此二地有關之經學設施、機構，以及相關經學家的遺蹟、文物及親友門生等。顧頡剛先生是這段時期極負盛名，也擁有極大影響力的學者，更難能可貴的是，在不依靠官方勢力或特定學術機構扶翼的情況下，顧先生的著作及相關文獻之保存、整理與出版、流傳皆具有相當程度的可觀局面，著實令人驚歎。而這其中的關鍵，除了顧先生生前對自己著作及相關史料的重視之外，最令人稱道的是，顧先生的後人及門生故舊在其晚年及身故之後，皆一直默默地在為顧先生著作的整理、出版與研究而盡心盡力，如顧潮、顧洪姐妹、劉起鈞(1917-)教授與王煦華(1929-)教授等。顧潮教授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重要，從早些年年譜之編定、傳記之寫作，直至現在，《顧頡剛全集》之編校，顧潮教授的工作分量越來越重，而隨著顧洪的逝世與劉起鈞、王煦華二老之年邁力衰，總冊數達六十鉅冊的《顧頡剛全集》

---

\* 車行健，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徐其寧，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的編校工作幾乎全部落在已為人祖母的顧潮教授身上。在考察期間，我們打聽到了顧潮教授的電話與地址，在七月二十九日晚上，林慶彰教授本想與我親赴顧潮教授家中拜訪，但顧潮教授當時正忙著校對《顧頡剛全集》的工作，家中堆滿了資料，不便待客，結果反倒是顧教授來到我們下榻的北京郵電賓館拜訪我們。於是趁著這個難得的機會，我們便對顧潮教授進行了訪談。顧潮教授雖是生長於江南水鄉，有著蘇州人的婉約與謙和（此性格與其父極像），但後來隨父北上，一直定居於北京，因此在言談之際也顯露出了北方女子的爽朗大方與直率真誠。在整個訪談過程中，顧潮教授幾乎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答，毫不保留地將她所知道的和盤托出，因此，不但訪談的過程極為順利，氣氛也相當愉快。當時參與聆聽訪談過程的考察團成員極夥，但主要提問者則有林慶彰教授、蔣秋華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龔鵬程教授（北京師範大學特聘教授）與本人。訪談稿先由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生徐其寧同學進行初步的文字記錄，再經本人整理修訂而成，全文最後復經顧潮教授本人及其他參與訪談者的校正。為了方便讀者閱讀，整理者大致根據訪談脈絡，將訪談稿做了必要的分段，並加上適當的段落標題。須聲明的是，為了內容的連貫，整理者不可避免地將某些訪談文句做了些相應的移易調整。當然，這樣的調整最後都經過訪談相關當事人的確認。（車行健謹識）

## 一、關於《顧頡剛全集》的編校

車：顧教授我想請問一下，今天下午我們聽王煦華教授說到顧頡剛先生遺稿整理分工的情形，他說您是整理日記，顧洪整理讀書筆記，論著的部分由王教授本人負責。現在預備出版的《顧頡剛全集》其中分工的情形是怎麼樣，具體的情況可否請您再詳細說明一下？

顧：《全集》整理工作的分工情形大致如王先生所說。顧洪除整理《讀書筆記》之外，又整理了有關邊疆與民族問題的論著一冊；還編了一冊《顧頡剛文庫藏書目錄》，這是她與文庫同事張先生一起編的。我除整理日記之外，又整理了書信；還整理了文集。王先生年紀大了，我幫他整理了古史和民俗兩部分論著。

車：現在《全集》出版的情形是怎麼樣了？

顧：我們二〇〇五年與中華書局簽訂了《全集》的出版合同，當年已經把大部分的稿件交去。二〇〇六年又把全部稿件編好、交齊。中華書局很重視這件事，作

為他們的重點項目，投入了很大力量。我們家屬對此非常感激。

車：《全集》預訂出多少冊？

顧：大約有六十冊左右。主要部分有：古史論文十多冊、讀書筆記十多冊、日記十多冊，這些已經有四十多冊了；其他還有民俗論著數冊、書信數冊、文集數冊，等等。

車：現在的進度是到什麼地方呢？

顧：現在《讀書筆記》的三校已經完畢，還要四校、五校。其他部分校樣也即將發回，所有稿件都要五校。我們請了幾位同事、朋友幫助校對。

車：北京中華書局出的《讀書筆記》與臺灣聯經出版公司出的《讀書筆記》有不一樣嗎？

顧：有不同。加進去了早年的那部分。我父親的筆記是從民國初年在北京大學做學生的時候開始寫的，他晚年整理自己的筆記，卻沒有包括早年的那一部分，大概是覺得那部分學術價值不是很大。後來我們編《全集》的時候，考慮到這部分筆記中有大量反映民國初年學術界以及社會狀況的資料，包括北大的不少情況，現在看來很有史料價值，還是應該收進《全集》的。顧洪在整理這部分筆記的時候，真是費了大力氣的，因為其中抄了很多當時的報紙雜誌發表的文字，可是這些報刊現在要查找非常困難，沒有辦法核對原文。所以在對這些字句進行斷句、加引號的時候必須反覆斟酌，這讓顧洪幹得非常辛苦。

車：顧先生在抗戰時期是否寫過一些較通俗的讀物，譬如像《晉文公》之類的？這些東西有沒有也收入《全集》中？

顧：《晉文公》這篇文章是他根據自己的講義改寫的。這篇文章大概沒有正式發表，我沒有看到。不過他寫的講義都收入《全集》了。

車：你們有編一個完整的目錄嗎？就是不管是存或是不存的，找到找不到的？

顧：我那本《年譜》後面有一個〈著述目〉，包括找不到的。

車：在《禹貢》半月刊裏寫的「通訊一束」也有收嗎？

顧：都收。包括半月刊裏他的案語、啟事、記事等等。

車：現在有一個問題，像林老師比較關心的，就是顧先生有些東西是別人代作的，這個情況你們會怎麼處理？

顧：那要分別情況處理。只要是我父親修改過的，就作為他的東西收入，並且註明是某人代作，經他修改的。如果是別人作的，沒有經他過目，而以他名義發表

的，就不會收入，像童書業(1908-1968)先生作的〈董仲舒思想中的墨教成分〉、〈有仍國考〉、〈讀春秋邾國彝銘因論邾之盛衰〉等文，就不收。

車：林老師聽王煦華先生說他也代作了好多文章，有這種情況嗎？

顧：那是一九七八年王先生調來做助手以後的事。例如〈崔東壁遺書序〉，我父親以前沒有寫完，其中寫成的漢代之前的部分已經發表（題〈戰國秦漢間人的造偽與辨偽〉，收入《古史辨》第七冊），漢代以後的部分僅蒐集資料，寫有草稿，後來由王先生將這些草稿連綴補充成文。又如〈「聖」、「賢」觀念和字義的演變〉一篇，是王先生把我父親讀書筆記中有關論述摘錄出來，連綴成文，經我父親改過的。

車：顧先生編的東西呢？將來要怎麼處理？

顧：我父親編的東西太多了，這次都沒有收入《全集》。像《古史辨》、《崔東壁遺書》、《古籍考辨叢刊》等等。以後中華書局等幾家出版社會考慮的。

林：《古籍考辨叢刊》第二輯，今天下午我們看王煦華先生正在校對，我擔心他不知道要弄多久。

顧：是的，這分校樣他已經看了很多年了。

車：顧先生早年編通俗讀物的時候印了很多唱本，現在這些還有嗎？

顧：還有一部分，不全了。

車：有計畫再把它們整理出書？

顧：現在有一位北大的研究生，做通俗讀物的論文。她已經把我們目前保存的這些通俗讀物全部拍下來，放在北大的一個網站，供大家使用。

車：顧先生抗戰勝利後為什麼不回燕京大學？

顧：那時候我祖父已經去世，蘇州老家有不少事情需要處理，我父親是家中獨子，不能不回家去安排。

車：他當年離開中山大學時，不是那麼嚮往回到北平嗎？

顧：是的，在抗戰前，北平真正是一個文化中心，對我父親有巨大的吸引力。

車：在他日記裏也反映了對洪業(1893-1980)的不滿，是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嗎？

顧：我父親對洪先生的不滿，主要是我父親在燕京大學工作期間承擔「《尚書》學」的課題，有一筆經費，抗戰爆發後日本人要抓他，他隻身跑到後方，在成都接到哈佛燕京學社的信，讓他報帳，可是那些單據都在北平，他認為這是給自己出難題，很生氣，就懷疑是洪先生在裏面怎麼樣了。其實我覺得人家讓按

時報課題費帳目，也是照規章辦事，沒什麼錯。實際上洪先生對我父親是很好，我父親到燕大工作就是洪先生極力推薦的，我父親對洪先生也是特別感激。不過兩個人性格不大一樣，洪先生比較專心於校內的工作，而我父親自九一八事變後在校外從事很多工作，包括通俗讀物社、禹貢學會等等。頭緒很多，校內的工作自然要受影響，洪先生有意見也是正常的。

車：當時他做那個《尚書》的課題好像是找顧廷龍(1904-1998)一起做的？

顧：那部分是《尚書文字合編》。

車：那個也收在《全集》裏？

顧：不收，那屬於編輯的資料。像課題中還有一部分是《尚書通檢》，由童書業先生等人幫我父親一起做的，抗戰前已經出版，同樣也不收入《全集》。

林：顧教授，我們很誠懇地希望您能來臺灣一趟，什麼時候您答應了，我們就邀請您。

顧：不好意思，等我把《全集》的事情做完後再考慮這件事好不好？再說，我是半路出家，你們要我談談我父親有關經學的研究，我對這方面並不懂，講不出多少有價值的東西，會讓你們失望的。

林：不一定講經學研究，講顧先生的生平、經歷、跟學術有關的問題。儘管您說外行，我們都感覺您很內行。

顧：像童教英(1940-)老師，她才是內行，她自己是歷史系畢業的，而且又跟隨她父親童書業先生學史，她才是歷史的行家，能講出很多對你們有價值的東西。

林：我們也要邀她。顧教授您就不要客氣，如果明年不行就後年，我們就等您。

顧：讓你們花很多錢，到時候我又講不出什麼，會覺得愧對你們。

林：您就去看一看，不一定那麼正式，座談會也可以，就好像今天晚上就是座談會。

顧：等《全集》事情完成後再說吧！

林：將來《全集》還是要把《日記》收進去嗎？

顧：當然會收。

林：臺灣版跟大陸版不一樣？

顧：會有一些差別。

龔：您收集的顧先生書信是怎麼收的？

顧：除了我父親當時錄下副本的或是存有底稿的，還有一部分家書，這是原件。其他的就是向他的友人、學生處查找，再就是向有關的圖書館、檔案館去找。這



當中不斷有人給我提供信息，說某處某處有，我非常感激大家的幫助。

蔣：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的陳廖安教授，當年就有意從一些刊物上收集顧先生的東西。

龔：那是在我編《國文天地》的時候。我們本來想出一個顧頡剛的集子，當時收了很多。

顧：喔，您還編過《國文天地》啊？

龔：原來我編的，後來是林慶彰編。當時集了好多，想由《國文天地》出一個《顧頡剛筆記》，我序都寫好了，結果卻沒有出。以後我聽說聯經在做，那我們就不用出了。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啦！

顧：我父親有一篇〈清初學者的政治思想〉是在《國文天地》發表的，一九九一年。

林：我們會幫忙收集一些臺灣學者的研究成果，妳可以參考。顧先生寫給屈萬里(1907-1979)先生的信我回去就把影印本寄給妳。

顧：那要謝謝你們了。以前石璋如(1902-2004)先生給我寄過幾張當年的合影，還有董作賓(1895-1963)先生的兒子也給我寄過照片。

車：《全集》可能會把照片單獨出嗎？

顧：中華書局可能會考慮，或是附在每一冊的前面。我父親保存的照片在文革的時候幾乎全燒了，留下來的不多。

林：顧教授你們編的《全集》，除了顧先生的照片之外，像他編的刊物的創刊號，或是他的著作的第一版，那個應該很珍貴，不然的話我們現在看《全集》都是現在的排版嘛！

顧：對，就沒有那種感性認識。

林：最早原來是什麼樣子，不清楚。像我們那天去郭沫若(1892-1978)紀念館，看他《卷耳集》，小小本，好像口袋本，我們就覺得很驚訝，早先是那樣一個小的版本。

顧：是的，我們已經拍了很多書稿、刊物的照片。

林：那個應該可以收進去，編成一冊圖版的。人的照片、書稿，還有他編的刊物的封面，還有他常常投稿的刊物啊，那一期有他的文章啊，都可以這樣做，這樣看起來就豐富多了。

顧：對！

林：也可以讓我們去回憶，了解當時的情況。

## 二、關於顧先生的子女及身後事

車：顧教授您大學念的是北京農機學院，為什麼後來會進社科院歷史所呢？

顧：當時我父親的東西缺少人手整理，所以把我調過去。

車：您的妹妹顧洪是念哪間學校？

顧：她在文革結束恢復高考之後，上的北京師範學院歷史系，現在改名叫首都師範大學。

車：後來也在社科院歷史所嗎？

顧：對，她用兩年讀完大學功課，就考上社科院研究生。那時我父親還在世，與劉起鈺先生合招的研究生。顧洪是科班出身的，她比我有根柢，我本來是學工的，對古史尤其是經學那麼高深的學問真是不懂。

車：可是我覺得您編的《顧頡剛年譜》編的非常好。

顧：那個工作做了十年嘛，對於材料比較熟悉。

車：可是剪裁很有方啊！

顧：這主要是依靠我父親留下來的資料。在一九四九年以後歷次政治運動中，為檢討自己的經歷，他多次寫過簡譜。在文革初期他為交代自己所謂的「罪行」，把每一本日記都寫了提要，貼在日記本首頁，那時日記還沒被專案組拿走。這些對我很有用，我寫《年譜》就是按照我父親這些簡譜和提要建立起框架，然後再充實內容的。

蔣：今天您提到您父親葬在哪兒？

顧：在北京西山鳳凰嶺，那裏有個佛山公墓。

林：那個是衣冠塚嗎？

顧：對，我父親去世後遺體捐獻給中國醫學科學院了，所以起初我們沒建墓。一直到我母親去世後，才給他們合葬的。

蔣：那遺體最後還有歸還給家屬嗎？

顧：沒有。就是在中國醫學科學院裏頭，我聽人說就是做了一副標本。

林：做一個標本？他有要你們去看還是……？

顧：（低語）我不想去看。

林：顧教授妳是不是還有個弟弟？他在哪裏？

顧：我弟弟在北京。

林：在學術界嗎？

顧：不在。

車：那顧先生過繼的兒子顧德輝呢？

顧：他在上海做中學語文老師，現在退休了，住在顧家花園。

車：顧先生跟第一位妻子生的二位女兒？

顧：我大姐叫自明，日記裏也叫她康媛，是聾啞人，前些年已去世。二姐叫自珍，日記裏也叫她良男，今年九十一歲了，住在南京。

林：年紀那麼大了！

### 三、關於顧頡剛先生的婚姻與感情世界

車：顧先生日記裏一直提到，他一直在追求譚健常（惕吾，1902-1997），當時顧先生的第二任妻子殷履安（1900-1943）女士知道嗎？

顧：知道啊！我第二位母親真是一個很好的人。我父親過世以後，我去訪問過譚女士幾次，有一次我問她：「我前一位母親過世以後，我父親不是跟妳求婚嗎？為什麼妳不答應呢？」她回答說：「我覺得這位師母，人格太偉大了，我根本不能跟她相比，我替代不了她的位置，所以就沒答應。」我想，這是她真心的話。我父親日記裏對此事另有記載：譚女士當時認為我家中人口單薄，就是我父親自己沒生兒子，應該娶一位能生孩子，能持家務的妻子，而譚是一位社會活動家，終日在外面奔忙，不能滿足我父親的需要，因此她覺得自己不合適。我想，這也是其中一個原因吧！殷氏母親對我父親的情意，在我父親日記裏也有很多反映。比如抗戰勝利後，我父親到天津去接收自己的稿件，這些都是殷氏母親和顧廷龍先生在我父親逃離北平之後替他收拾、寄存的。我父親見到每包文稿上母親寫的封條，睹物思故人，心裏就已經很難受了，沒有想到打開其中包紮得很牢固的一個小包，竟然看到自己在廈門大學時寫給譚女士的一封長信，他受到極大的刺激，用日記原話說，就是「幾欲瘋狂」了<sup>1</sup>。為什麼呢？

<sup>1</sup> 見顧頡剛撰：《顧頡剛日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年），卷5，頁615，「1946年2月28日」。



我父親寫這封信的時候，家眷沒到，一個人在廈門，心情不好，他有很多話想對譚傾訴，可是當時譚的行蹤也不定，沒有確切地址，寫完也沒法發出去，時間一長，他自己也不知道這封信藏到什麼地方了。按說這封信也可以稱為情書，但我這位母親在整理文稿時見到，並沒有毀棄它，而是特地牢牢地包好，她的心胸真是太寬厚了。她對我父親與譚女士之間的情誼是這樣地尊重，讓我父親感到無以回報。

車：顧先生不是還在日記上寫想要娶妾嗎？

顧：那是在西北考察的時候，不過並沒有實現。

車：殷履安女士知道嗎？

顧：她知道。我父親有失眠的老毛病，殷氏母親晚上總要拍他入睡。可是在西北考察的時候，我父親一個人，就難以入眠。於是當地人建議他找一個人照顧，還幫助他找，後來沒找到合適的，他不久又離開西北，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我覺得殷氏母親真是一位賢妻良母，對我父親幫助有多大啊！無論在生活上，還是在工作上，現在我父親的遺稿裏有好多都是她抄寫的。我對她是特別地敬佩。

#### 四、關於顧頡剛先生的門生與交遊

林：顧教授我請教妳一個問題，顧先生那麼多學生，跟您比較有來往的是誰？

顧：他的學生目前還健在的已經很少了。我接觸比較多的有黃永年(1925-2007)先生，今年一月剛去世。還有史念海(1912-2001)先生、侯仁之(1911-)先生等。

林：黃永年先生是當過顧先生的助理嗎？

顧：我父親在六〇年代整理《尚書》的時候，想調三個人作助手，一位是劉起鈞先生，一位是王煦華先生，還有一位就是黃永年先生。大概是因為黃先生當時戴著「右派分子」的帽子，就沒有調成。

林：何定生(1911-1970)妳對他了解多嗎？

顧：不多。他後來不是去臺灣了嗎？

林：是。但是在臺灣也很少人注意他。

顧：我父親當年跟何先生有多封通信，我已收在《全集》裏面。為了介紹收信人的

簡單情況，我就請臺灣某位學術界的朋友幫忙。後來他就把資料複印寄來了，是一份何先生的簡歷，大概是他本人填寫的。

林：那可能是在臺灣大學的某個檔案裏找到的。

車：何先生那個時候跟顧先生回到北京的時候是不是有寫過一個小冊子，叫《關於胡適之與顧頡剛》？

顧：對，我父親藏書中有一本。

車：內容是什麼？

顧：裏面既有他自己的文章，也有別人的文章，很薄很薄的一小冊。其中有一些是批評胡適(1891-1962)先生的學術觀點的。

林：妳對趙貞信(1902-1990)了解多嗎？

顧：聽說過一些。他晚年中風了，癱瘓了在床上說不出話來。我曾想向他了解一些禹貢學會的情況，但可惜沒能實現這個願望<sup>2</sup>。

林：他好像點了好多《古籍考辨叢刊》？

顧：對，第一冊裏〈論語辨〉，第二冊裏面的歐陽修(1007-1072)、葉適(1150-1223)、袁枚(1716-1797)、崔述(1740-1816)、俞樾(1821-1906)等五種〈辨偽書語〉，都是趙先生輯點的。

林：是，我看他點了不少，顧先生很倚重他。

車：當時禹貢學會那些書呢？

顧：後來就送給中央民族學院了。十多年前我也想找這批書，因為當年學會為捐款及募款的人作紀念，在一些書上是蓋有紀念章的。我很想看一看這個印章的式樣，就請吳豐培(1909-1996)先生幫忙。吳先生是禹貢學會的會員，後來擔任民族學院圖書館的館長，雖然已經退休，跟館裏面的人還是很熟悉的。他幫我聯繫了現任的館長，但他們也沒有找到這批書，因為裏面的變化也很大。直到吳先生去世前，我最後一次去看他，一見面他就說：「真抱歉，妳託我的事沒能辦成……。」這種真心誠意讓我十分感動。

車：吳豐培一直都是在中央民族學院嗎？

顧：對，自從五〇年代直至去世，他都在民族學院工作。後來還在社科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兼職，他是邊疆史地研究這個領域裏一位非常重要的學者。

<sup>2</sup> 趙氏係於1990年12月逝世於北京。

林：顧教授，張西堂(1901-1960)的情況妳了解嗎？

顧：我不大知道，他後來不在北京，而且去世較早。我父親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時，在日記裏說：「老友又弱一個。」<sup>3</sup>

林：好像他兒子還在。我看臺灣出了一本《穀梁真偽考》（臺北：明文書局，1994年），是他兒子點校的。

顧：我不知道他兒子的情況<sup>4</sup>。

林：《古籍考辨叢刊》第一集好像有張西堂點校的。他當時也是禹貢學會的會員？

顧：三〇年代我父親編輯出版的《辨偽叢刊》裏，有張先生點校的《唐人辨偽集語》和《古學考》。五〇年代我父親編輯《古籍考辨叢刊》的時候，把這兩種分別收入第一集、第二集。至於禹貢學會，當年學術界許多朋友都參加了。

林：顧教授對樸社、景山書社了解多嗎？

顧：他們的舊址我都去找過。八〇年代我一邊整理遺稿，作年譜，一邊就去找這些舊址，想拍照片。但沒找到景山書社舊址。

林：景山書社是不是可以算樸社的門市？

顧：對，門市部。

車：馮友蘭(1895-1990)也當過樸社的社長。

顧：在我父親去廈門、廣州任職期間，馮先生主持過社事。

林：景山書社是不是在景山附近？不然的話怎麼叫景山？

顧：是啊，它就在景山東街，北京大學二院對門。

林：那門牌號碼還在嗎？

顧：沒有了。在那一帶我只找到大石作胡同，我父親曾經住過的院子，在北海和景山之間，那是他寫《古史辨》第一冊自序的地方。

車：後來跟顧先生合編《禹貢》半月刊的馮家昇(1904-1970)先生呢？

顧：他去世了，是在文革當中。他本來有心臟病，那時候知識分子受批判，要勞動改造，讓他挖防空洞，結果心臟病就發作了。

<sup>3</sup> 見顧頡剛撰：《顧頡剛日記》，卷9，頁31，「1960年2月18日」。

<sup>4</sup> 張西堂之子為張銘治，1949年生，畢業於西北大學歷史系，獲得史學碩士學位，曾任陝西歷史博物館科研處處長、中國秦漢史研究會副秘書長及《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副主編，現任陝西省文物局《陝西文物年鑑》編輯部副主任，專研秦漢史。

車：他是在哪個學校？

顧：是在中央民族學院。

車：那像這張「禹貢學會全體職員合影」照片中出現的還有欒植新、韓儒林(1903-1983)等幾位先生，您對他們了解嗎<sup>5</sup>？

顧：韓儒林先生後來在南京大學，文革中挨整很厲害，健康受到很大傷害。文革後沒幾年就病逝了。照片裏的欒植新、陳增敏等人，我都不知道他們的情況。

林：我在臺灣的東吳大學的圖書館看到顧先生親筆簽名送的書，叫做《漢代學術史略》，送給袁帥南（榮法，1907-1976）。妳知道這個人嗎？

顧：袁帥南嗎？我家在上海有幾年住在武康路，那就是他的房子。

林：喔，這樣啊！

顧：袁先生那時候到臺灣去了。

林：是，到東吳大學教書，東吳大學中文系。他後來過世了，這本書就送給東吳大學，我在圖書館有看過，那個簽名我也有印下來，我會寄給妳。顧先生為什麼住他的房子？跟他是好朋友嗎？

顧：不是朋友，我父親原來不認識袁先生。當時袁先生搬家去臺灣，想找可靠的人家住進那所房子，大概是通過顧廷龍先生還有別的人介紹，就找到我父親了<sup>6</sup>。

林：後來那房子……？

顧：七〇年代初我去上海找過那所房子，樓還在，可是花園已經沒有了，蓋上新房子了。

<sup>5</sup> 此張照片載於顧潮撰：《歷劫終教志不灰——我的父親顧頡剛》（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172，攝影時間為1937年3月。

<sup>6</sup> 關於此事的原委，顧頡剛在日記裏有詳細的記載，其謂：「袁帥南君，前上海道袁樹勛（謹案：當作勳）之孫，操律師業，住福開森路（今名武康路）二八〇弄九號，洋房一棟，前有草地，今以將去臺灣，恐為兵占，擬借與人住，起潛叔聞之，因介紹予，得其同意。今日與靜秋往觀，頗合理想，惟二層渠已許金陵大學靳君，而廚房只有一所，恐兩家合住不方便耳。予能住此，則離合眾圖書館較近，有參考之便，又附近無兵營，使人安心，而庭院頗大，潮兒可以活動，均為優點。惟離大中國較遠，往返費時耳。」（見《顧頡剛日記》，卷6，頁420，「1949年2月14日」）此外，在其讀書筆記中亦有述及居住此屋的狀況，其云：「予於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自虹口山陰路遷於滬西武康路之袁氏剛伐邑齋。其地鄰近法華鎮，古法華寺者，上海一劇蹟，與龍華及靜安寺鼎足而三者也。袁氏多藏書，任予取資。」見《法華讀書記·一》，《顧頡剛讀書筆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卷5上，頁2689。

林：袁帥南那時候在大陸算有錢人嗎？

顧：應該算有錢吧，那所花園洋房很不錯的！

車：那山陰路的宅子呢？

顧：那是我很小的時候住過，已經沒有印象了。

龔：您說的那個袁帥南先生是在東吳教詞章的嗎？他們是個世家啊！跟陳伯嚴（三立，號散原，1853-1937），就是陳寅恪的父親，他們很熟的。他有一個先輩叫袁伯夔（思亮，1879-1939），替陳三立代筆很多文章，本身還有《覆盦文集》，臺灣文海出的<sup>7</sup>。袁帥南是袁伯夔的兒子還是姪兒，我記不太清楚了<sup>8</sup>，你查一下文海出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那一套，裏面有他的集子。陳伯嚴不是有文集嗎？除了詩集以外還有文集，文集裏面有一些。他們本身是世家，所以他們可能〔在上海有房子〕，遺老都在上海買房子嘛。像陳散原他們也都在上海待過一段時間。

林：當時在廈門大學，顧先生好像跟魯迅(1881-1936)感情不太好？

顧：是的，其實據我父親留下來的文字資料可以看出，他在北大工作期間，對周氏兄弟的一些作風就不太喜歡。他起初也是《語絲》的撰稿人，後來不參與了，大概跟這點有關。

林：但是我覺得魯迅講的話很刻薄。他說顧先生冬天鼻子會紅，這個紅鼻子除了鼻

<sup>7</sup> 袁思亮，字伯夔，號覆盦，湖南湘潭人，曾投贄陳三立門下，早年曾任清廷農工商部郎中，民國肇建後，曾與張君勱(1887-1969)等人籌組共和協進會。後因對北洋政局灰心，遂隱居上海不出，著有《覆盦文集》四卷、《覆盦詩詞集》二卷、《冷芸詞》一卷。關於其事蹟可參王爾敏編：〈袁思亮小傳〉，《袁氏家藏近代名人手書》（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頁133-134。

<sup>8</sup> 袁帥南，名榮法，以字行，湖南湘潭人。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生，民國六十五年(1976)逝世。少承家學，治經史稱精博，尤工詞章。弱冠從伯父袁思亮寄寓上海。1930年，海上詞人共擁彊村老人朱祖謀組滬社，帥南入社，年最少。1934年畢業於上海持志學院法律系，以法學士執律務於上海，旋獲膺選為上海律師公會執行委員。1948年底抵臺灣，先後擔任教育部中華叢書委員會委員兼編審、行政院長機要室文書、參議之職，並兼國防研究院修訂清史編纂委員。公職退休後，應私立東吳大學聘任教授，以詞選教授諸生。（以上據袁孝俊：〈捐贈緣起〉，《袁氏家藏近代名人手書》，頁7；袁孝儒、袁家傑、袁孝俊：〈序〉，《館藏近代名人法書集屏》〔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95年〕；張壽平(1925-)編：《近代詞人手札墨蹟》〔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5年〕，下冊，頁826。）

子會紅以外什麼都沒有。有講過這個話嗎？

顧：魯迅在跟許廣平(1898-1968)的通信裏，罵我父親的話很多。

林：顧先生不是也借錢給他嗎？在廈門大學的時候借五十塊給他？

顧：這件事我不知道。

林：我好像在哪裏看到？

顧：我父親經常幫人，一般不入日記。像馮家昇先生在燕京大學唸書的時候特別用功，學問也很好，可是家裏窮，交不起學費。我父親就給他錢，幫他繼續完成學業。這件事我原來並不知道，是在我父親去世後，馮先生的夫人來我家看望的時候談到的，她說馮先生一直不忘記這件事。

車：您跟錢穆(1895-1990)先生的家人的關係如何呢？

顧：一九九三年我們在蘇州開會紀念我父親百年誕辰的時候，錢夫人為會議資助了經費，我們很感激她這份心意。在會上還見到錢先生的幾位子女。在此之前，大約是一九八八年，我們為了父親《讀書筆記》出版的事情，曾託人與錢先生聯繫過，儘管當時他身體已經很衰弱了，但仍然很關注這件事。可以說，《讀書筆記》能在聯經公司順利出版，是離不開錢先生夫婦的大力幫助的，我們真是由衷地感謝他們。錢先生過世後，錢夫人來北京，想從我父親日記裏尋找有關錢先生的資料，她說當年錢先生離開內地到香港的時候，就隨身帶一個小箱子，除此之外沒帶其他行李，她幾乎沒有見過什麼此前有關的文字資料。我們給她找出來日記裏面許多相關的記載，她從中了解到錢先生當年的交往狀況，並且很有感觸，覺得當年學術界眾多友人之間能夠那樣頻繁地交流、切磋，那種氛圍真是令人神往；可惜後來就分開了，各奔東西了，這對中國學術的發展不免是一種損失。

車：顧先生在日記裏不是也有提到在齊魯大學那段時間，他對錢穆有些微詞？

顧：當年朱家驊(1894-1963)先生要我父親到重慶去編《文史雜誌》，我父親怕他走後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前途會受影響，因此他雖然請錢先生來主持所務，可是自己依然兼任所長。他想等到錢先生地位穩定了，自己再正式辭職，所長這個位置自然就是錢先生的。以前他離開中山大學的時候就是同樣做法，當時他請商承祚(1902-1991)先生擔任語言歷史學研究所代理所長，所長仍是自己兼任，當然他只要所長的名義，而把所長的薪水充作所內工作經費，等商先生地位穩定了自己再辭職。我父親總是從學術工作的需要出發來考慮問題，他一



心想的是學術的發展，而不是個人的地位、名利。不過他的做法往往被人誤解，以為他想把持所長的位子，不信任別人。可能錢先生也會有這種誤解。

龔：可是錢先生在他的《師友雜憶》裏面，最推崇的還是顧頡剛。他對北京學者都沒一句好話啊！除了顧頡剛以外，我看錢先生對北京學者都不很欣賞，對其學風也不太欣賞。

顧：我覺得我父親是一個書生，他太不會圓滑處世，這一點他跟傅斯年(1896-1950)先生是截然不同的。傅先生特別會辦事，特別有組織能力（林：特別霸氣）。我父親在《古史辨》第一冊自序裏說自己有雙重人格，在治學時候十分鎮定堅強，有鑑別力，而在處世時候卻往往急躁慌張、優柔寡斷。這的確是實情。

車：可是顧先生能搞出那麼多成績，又是禹貢學會，又是通俗讀物編刊社，搞那麼多的活動，我覺得他的活動能力或他的才幹也不會比傅斯年差到哪裏去。

顧：我父親沒有傅先生這麼會用人，這是他欠缺的地方。

車：可是他提拔的這些人，後來不也都成為蠻重要的學者？

顧：那是在學術上，他開出了新的領域，造成了新的風氣，培養了許多學者。

林：我看了顧先生的日記，裏面多次提到四川的經學家李源澄(1907-1958)，妳知道這個人嗎？

顧：我從我父親日記裏知道這個人，可是沒有接觸過，不了解，不知道他後來怎樣？

林：他是在反右的時候發瘋了，後來就死掉了。吳宓(1894-1978)的《日記續編》裏面記了二三頁他過世的過程。如果妳要參考他的資料，可以在吳宓的《日記續編》裏找。

## 五、其 他

車：顧先生寫的日記是不是有二種？像他在寫《辛未訪古日記》的時候，是不是同時在寫日記？我有稍微對過這兩種，《辛未訪古日記》寫得比較詳細，日記寫得比較簡略。

顧：我父親的日記寫得比較簡單。他寫旅行日記的時候，無論是《辛未訪古日記》，還是《西北考察日記》，都是旅行歸來之後，再以原來的日記為線索，又補充了一些資料。

林：就是有點要寫書的意味。

車：他好像還有一種小的日記本。

顧：那是懷中筆記本。他的日記是大開本的，出門時候不便於攜帶，就留在家裏。出門時候他就把日記寫在懷中小本上，等回家以後再謄到大本上。

車：那等於也是寫二次？

顧：對，有時候來不及謄寫的，時間一久就丟了，像一九五〇年他到北京開出版會議，緊接著又到西北農學院組稿，回到上海後沒有及時把日記補上，結果這段日記就丟了。還有像一九四四年底他從重慶到成都齊魯大學講課，日記寫在零紙上，回去以後也沒及時把日記補上，好在那些零紙還夾在日記本裏面，能夠補入。

車：他有讀書筆記，也有寫日記，那他一天的時間安排到底是怎樣？

顧：他白天基本上是伏案工作，他寫字非常快，要不然他的字怎麼都是行書、草書呢。

林：對，我看他給屈先生的信，字如行雲流水。

車：像他在《西北考察日記》裏也寫到他一天到晚幫人題字，他的書法怎麼樣？

顧：當時他給西北人題的字，我沒有見到。聽說他給一些寺廟題的字，有刻在建築物上的，後來在文革當中都被毀掉了。

林：民國初年學者的後代，應該是妳幫令尊的事情做得最多，寫很多書啊！一生都在整理他的東西。

顧：我父親晚年看到自己有這麼多事情沒有做完，心裏特別著急，總是說自己活不了多久了，要抓緊。我看到他著急的樣子也很難受。可是那時候他身體越來越差，經常住醫院，我只能和家人在他身邊照顧他的生活。我父親去世以後，面對那麼多的遺稿，歷史所和社科院的領導也很重視，安排我和妹妹顧洪協同劉先生、王先生一起，從事整理工作。這對我來說是責無旁貸嘛，當然要全力以赴去做。

林：劉起鈞先生後來搬到南京去了？

顧：是的。

林：我曾邀他到臺灣過，我也去過他家好幾次，寫給我的信大概有二十多封。劉先生的字很漂亮，寫得很工整。他最近出了一本書，去了那邊還能編書嗎？

顧：基本上可以說不能工作了。

林：這麼晚了，我想我們送妳回去吧！

顧：謝謝，不用送。

林：不用客氣吧，在車上還可以請教妳一些事情。

## 附錄：顧潮教授論著目錄

### 一、專著：

1. 《顧頡剛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
2. 《顧頡剛評傳》（與顧洪合著），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年。
3. 《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顧頡剛卷》（與顧洪合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4. 《歷劫終教志不灰——我的父親顧頡剛》，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
5. 《蕪弛齋小品》（顧潮選編），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
6. 《顧頡剛集》（顧潮選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
7. 《顧頡剛學記》，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

### 二、論文：

1. 〈顧頡剛與魯迅〉，《中外雜誌》，1989年第8期。
2. 〈顧頡剛先生的前二次婚姻〉，《人物》，1991年第6期。
3. 〈我的父親顧頡剛〉，《文匯報》，1991年7月24日。
4. 〈顧頡剛與傅斯年在青年時代的交往〉，《晉陽學刊》，1992年第1期。
5. 〈顧頡剛在辛亥革命前後〉，《民國春秋》，1992年第1期。
6. 〈顧頡剛先生傳略〉，《文史哲》，1993年第2期。
7. 〈顧頡剛致胡適的信〉，《文匯讀書周報》477號，1994年4月16日。
8. 〈略論顧頡剛先生研究古史的方法〉，《中國史研究》，1994年第4期。
9. 〈顧頡剛先生未刊的八封信〉，《學習》，1994年第6期。
10. 〈對我父親八封信的詮釋〉，《學習》，1994年第6期。
11. 〈顧頡剛遺札〉，《學術集林》卷1，1994年8月。
12. 〈顧頡剛先生與禹貢半月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7年第3期。
13. 〈顧頡剛與胡適〉，《胡適研究叢刊》第3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8年。

14. 〈顧頡剛先生與史語所〉，杜正勝、王汎森主編：《新學術之路——中研院史語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年。
15. 〈開創古史研究新風的先驅——顧頡剛〉，蕭超然主編：《巍巍上庠百年星辰——名人與北大》，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16. 〈禹貢學會小記〉，慶祝楊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論文集編委會編：《慶祝楊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論文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17. 〈顧頡剛《檀痕日載》〉，《藝壇》卷1，2000年3月。
18. 〈五四時期的顧頡剛〉，郝斌、歐陽哲生主編：《五四運動與二十世紀的中國——北京大學紀念五四運動八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
19. 〈禹貢學會的復員與結束〉，張政烺先生九十華誕紀念文集編委會編：《揖芬集——張政烺先生九十華誕紀念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
20. 〈顧頡剛先生對歷史地理學的貢獻〉，《燕京學報》新12期，2002年。
21. 〈關於古史的破壞與建設——論顧頡剛先生的治學〉，《炎黃文化研究》，2002年第9期。
22. 〈顧頡剛學案〉，《百年學案》，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3年。
23. 〈我父親顧頡剛先生的書信〉，《東方文化》第4期，2003年。
24. 〈學習父親為學術事業而獻身的精神〉，《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3年5月20日。
25. 〈影響顧頡剛治學命運的書〉，《北京日報·理論周刊》，2004年11月29日。
26. 〈顧頡剛先生與甬直保聖寺塑像〉，錢理群、嚴瑞芳主編：《我的父親與北京大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